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专题研究

教育的符号性与符号现象

崔岐恩,赵敏,王志荣

(温州大学符号教育学研究所,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教化即符号化。教育就是以人生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符号化,教育活动本质上是符号运作的过程。符号是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元工具,也即教育活动只有通过符号这一工具才得以展开。教育的四大要素(教师、学生、内容、手段)都以符号为表征,也只有通过符号才能彼此关联、形成教育性意义场。善喻者方为良师,而“喻”属于逻辑修辞符号学范畴。教育与符号在实践中统一。教育通过符号获得可持续发展,意义通过教育使符号获得趋近真理的解释。符号通过教育赋予世界以全新的意义,从而不断丰富符号理论,进而促进解释符号、改进符号、完善符号、创造新符号,最终不断推进符号教育实践。

关键词:教育;教化;符号化;符号性;符号现象;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21)04-0023-06

DOI:10.13971/j.cnki.cn23-1435/c.2021.04.007

The Semiotic Nature of Education and the Semiotic Phenomenon

CUI Qi-en, ZHAO Ming, WANG Zhi-rong

(Institute of Semiotic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indoctrination is a kind of symbolization. The education is symbolization for the direct purpose of life happiness,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re essentially the process of semiotic operation. The sign is the meta-tool of all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that i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can only be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signs. The four elements of education (teacher, student, content, method) are all represented by signs, and only through signs can they b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form an educational meaning field. Good metaphors can make a good teacher, and "metaphor"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logic and rhetoric semiotics. Education and signs are unified in practice. The education can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signs, and through education the meaning can get closer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uth. The sign endows the world with brand-new meanings through the education, thus enriches the semiotic theory unceasingly. And then it promot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signs, improves signs, perfects sign, and creates new signs, which finally advances the semiotic educational practice unceasingly.

Key words: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semiosis; semiotic nature; semiotic phenomenon; semiotics

哲学家怀特说“一切人类行为都是在使用符号中产生的。正是符号把我们的猿类祖先转变成人,赋予他们人性。只有通过使用符号,全部人类文明才得以产生并获得永存。正是符号使人类的婴儿成长为完人,未曾使用符号而成长起来的聋哑人则不能称之为完人。一切人类行为皆由使用符号而构成,或依赖于它。人类的行为是符号行为;符号行为

是属人的行为。符号就是人性之全体。”^[1]可以说,符号与教育几乎是同步出现的,它们对于人类改造和自我发展的意义不可忽视。符号之于教育,犹如竹木之于舟船,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同时,人的符号化教育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复杂过程,甚至历经几百数千年才能完成的。符号的极大丰富乃至体系化也就是教育完备和高度发达的标志,这是

收稿日期:2020-12-06

作者简介:崔岐恩(1975-),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符号教育学研究。赵敏(1996-),女,在读硕士。主要从事符号教育学研究。王志荣(1997-),女,在读硕士。主要从事符号教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哲社重大项目:面向自然语言理解的逻辑构建和符号接地问题的哲学、心理学研究(18ZDA032);浙江教育厅项目:小学生符号意识研究(Y202043191);温州大学侨特色项目:马来西亚华侨对中国符号的认知特征与趋势研究(202010)

教育发展的规律,也是符号演进的必然特征,无可逆转。经年累月的符号化教育让人逐渐成为完人,而这种完人则是支撑人类文明的基座,也是构筑起五彩斑斓、多姿多彩的人类社会的基础。

一、教育的符号性

教育的四大要素(教师、学生、内容、手段)都以符号为表征,也只有通过符号才能展开。作为主导和主体的师生,首先是以符号意义为生存之基的存在,然后才称其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正如卡西尔所言“人是符号性动物”。教育教化的内容总是表现为符号,如教材学材是文字符号,思维导图、看图识字、影视教学属于图像符号。教育手段也必然以符号化手段来表达和传递,如讲授法运用语言符号,多媒体使用科学符号,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使用虚拟符号。^[2]善喻者方为良师,而无论明喻、暗喻,或借喻、提喻,都属于逻辑修辞符号学范畴。

从教与学的过程看,符号的输出与传播是一种信息的供给、接收、转换的过程,也可以视为一种典型的教育活动。符号必须携带某种意义、认知、理念或概念才能使其具备更广泛的价值。在教育活动中,符号携带的认知、意义、概念通常与教育教学的实践相关,也与教育教学的理论内容相关。正是由于符号的简约化、信息化和传播性的特征,才使得符号的传播、输出与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具备教育性的特色,让符号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作用愈发明显。^[3]

(一) 教育即符号化

教育就是以人生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符号化。符号的运行具备“符号、对象、解释项”三类要素,而三者之间借助“动力因果,目的因果,形式因果”的关系进行运转并相互作用,其中的选择也随机变化,构成了符号运转的基本业态和模式。所以,符号学家认为,人的符号化的过程就是人的发展与改造的过程。其实,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不仅可以掌握、理解大量的符号,而且可以借助符号完成情感沟通与交流,以符号为载体建立起灿烂的文化体系,并且构筑伟大的人类文明。^[4]符号是改造人和教育人的工具,对于人的发展与境界的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符号的出现与人类文明的自我改造是同步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教育活动。符号具有指向性,是对意义的具体解释,同样与人的关切有密切的联系。

教育的本质就是人的符号化的过程,这是因为人类具备以主体的抽象思维能力对客观世界进行解释并建构符号文明体系的能力,这自然也是符号存在的最核心意义所在。同时,人类还通过符号的传递、传播和留存来延续文明基因,让文化符号成为人类发展的血脉。通过有效的教育,人类可以更好地积累符号元素,并久而久之地形成符号体系,而符号体系的完备其实也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符号的出现、发展和运用的过程就是教育,而教育将人改造为符号人的过程反映了教育的实质。^[5]

从符号学研究的轨迹和脉络来看,索绪尔、皮尔斯和卡西尔等学者在长期的研究活动中逐步构建并完善了现代符号学的理论体系,并将其逐步推向应用。随着近现代以来语言符号学、艺术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伦理符号学等学术体系

的建立,符号学的应用范畴进一步扩展并增强,也让构建一门符号教育学的夙愿成为了许多教育工作者的迫切追求。实际上,从符号的概念、特点及应用价值来看,其与教育的关联是极为密切的,二者是一种内在交织的关系。然而,真正意义上关于教育的符号学理论并不完整,符号教育学的理论建构仍然处于摸索的阶段,这与教育和符号之间存在如此密切联系的现状极为不符。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尽快建构和完善“符号教育学”有更加强烈的愿望。实际上,建构完善的“符号教育学”理论体系并将其真正地推向教育实践应用,确实需要一大批熟知符号学理论与教育学的学者、工作者付出巨大的努力。

从本源上来说,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化的行动,符号对于人的改造、提升本来也就是教育。越是复杂、紧密的关联,反倒使得人们从复杂紧密的关联中抽丝剥茧而创造一种学科变得困难重重。但是从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研究人员的工作来看,基于符号学理论基础和现代教育成果的符号教育学模型正在形成,并且正在与现代教育实践完成对接。要知道,之所以构建符号教育学体系的任务显得十分紧迫且重要,主要是因为人们愈发认识到现代教育实践必须借由科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加以指导,而符号学则能够很好在其中发挥作用。所以,认识到符号是一种典型的教育活动,就明白了教育不能脱离符号而存在且发挥作用。基于此,推进现代符号教育学理论的梳理、整合,并基于科学的方法和策略来建构贴合实践的理论体系,无疑是现代教育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内在诉求。

(二) 教育本质上是符号运作的过程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1944年在《人论》一书中断言“人是符号的动物”,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教育与符号的研究基础。诚如前文所述,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符号传播、传递和输出的过程。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教育教学,还是现代基于信息化技术、网络环境的教育教学活动,都是将某种特定的符号传递出去的过程,是一种基础性的符号信息播散的过程。因此,教育的实践活动与符号传播是存在极其密切的联系的,二者的复杂关系可见一斑。

从符号的产生、发展以及符号学的发展轨迹来看,符号与教育的关系是一种“天然存在”的联系。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对人的改造来提升人的意义深度和广度,让人成为更完善、更丰富和更有效的人。而在这个过程中,符号扮演的角色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可以用“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来形容。符号学的研究认为,人的符号化就是教育推进的过程,也是人能够更为完善和持续演进的过程。符号的工具性、基础性和广泛性,使其在教育活动的推进过程中具备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正是由于符号的诸多特质和优势,才使得教育实践中符号传递与传播成为了教育本质的内蕴,而教育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携带意义就是因为教育必须借助符号这一载体才能完成。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成为符号化的人,成为对世界、对自然进行符号化理解和感悟的人,这是教育最后要达到的诉求。符号在教育改造人的整个过程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价值,其传递、传播的价值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关切。^[6]

卡西尔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7]可以说,教育本质上就是人的符号化的过程。通过对人的符号化的感染、改造,让符号成为主导人的重要工具,并且教给人更多运用符号来理解、认知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这就是教育最终要达成的诉求与目的。从卡西尔的话中不难看出,符号化的过程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存在某种契合。唯物辩证法认为,思维主导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则产生了新的思维,从而让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未来。换言之,思维来源于人类实践活动,而科学、正确和先进的思维被用以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人类的科学、正确与先进的思维就是一种符号,是一种对于特定意义的感知。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来源于客观的实践,也来源于各式各样的教育活动。教育并非只限于学校教育,同时也包括社会实践教育、生活教育、知识经验的传授教育以及其他思维改进演化的教育等。教育让约定俗成的、被证明了的正确符号化思维有效地散播和传递开来,从而让被教育者更快速、更准确掌握这些符号思维,并用于指导实践活动。

人是符号的动物,也是一种被教育的动物。人类学家认为,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最大区别便在于,人类拥有极其复杂的思维意识,并能够运用思维意识来改进和提升自己的实践行为。包括大猩猩、长臂猿等灵长类动物在内的其他高智商动物,都不能掌握如人类这般复杂的思维意识,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如此复杂的实践行为。在人类自我驯化以及驯化后代的长期演进过程中,教育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而符号一直都是教育活动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元工具”。也就是说,符号是教育的最基础工具,也是一切教育工具的工具。认识到符号的“元工具”属性,便能够理解为什么教育必须依托符号来发挥作用和影响力。

早在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学”的时代,研究学者就认为语言是最大的一门符号学门类,而语言派系中的符号形式和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而借此语言形成的符号、指号或者符码自然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形成了完善的意义体系。虽然后来经历了皮尔斯、卡西尔等大家的发展,符号学的范畴已经大大拓展了,完全脱离了单纯语言符号的桎梏,但是不得不承认语言符号仍然是符号学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甚至也是教育符号系统的基础,至少是教育符号体系的核心工具之一。正是借助各种各样丰富的语言符号或指号,教育才能持续地推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才能有序进行,教育的知识才能得到很好地储存、传播和扩散,教育形成的文明才能传承有序延续下去,基于文化和族群的文化系统才能得到很好地发展。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运用语言符号来传递知识、经验和能力,这就是教师需要完成的任务。^[8]

而衡量学习者是否具备良好学习能力和符号储备的重要标志,往往也就是其对于符号、指号、符码的理解、认知和应用水平。能够很好掌握、运用甚至完善、创新语言符号,也就具备了良好的学习基础,甚至可以开展一些创造性的学习活动,这自然是教育的重大成果。反之,如果接受教育的学习者失去了对于语言符号敏锐的感知和理解能力,自然也就

不具备很好的符号使用和创新的能力,其学习的深度、广度都必然严重受限。

从教育的本质而言,皮尔斯认为“大学应该是不包含教授的学习场所”,其强调的就是教授、学生都是学习者,而不是任意发号施令的对象或主导者。^[9]教育要以特定符号的传递、传播为核心诉求,最终达成学习者对于教育符号解释能力的提升,让这种解释意识更加勃发、解释的能力逐渐增长。以语言符号学来说,透过良好的教育和学习实践,学习者确实可以在解释性的符号研究中得到新的知识,进而创造全新的符号或符码,形成教育符号与知识的拓展。例如,古人在教授诗歌写作技巧时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一方面说明了技巧反复记忆和熟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复合训练的重要性;现代的教育经常强调学生要做到“熟能生巧”,要通过对现有符号的丰富理解和认知来获得全新的自我解释。

二、教育中的符号现象

(一) 教育活动中符号“无处不在”

教育活动与符号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可以说符号是教育活动推进的核心载体。作为一种具备意义的感知体,符号的价值体现在教育活动推进的各个层级、细节上,也表现为教育活动的各类通道上。严格来说,教育活动的推进要借助符号来完成,教育活动的知识、理论、实践和渠道都必须依赖符号及其体系来实施。教育活动中的符号是无处不在的,具体表现为符号的包容性、多样性和广泛性。如,教育活动中的符号表现形式是极为多元的,既可以是具体的形态,也可以是抽象的形态;同时,教育活动中的符号具备广泛的应用性,既可以是视觉性的符号,也可以是听觉性的、感觉性的符号。对于参与到教育活动中的人来说,教育符号的多样性使得教育活动的开展更具选择的空间,也促使教育活动的基础更为稳固,意义更为多元。^[10]

教育者,教书育人也。从古代中国先贤和西方哲人的许多关于教育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教育要强调知识体系的传承和对人的改造两个方面。前者更加突出物质层面的知识内容、文化脉络的延续与传承,后者更加强了对于人的主观思维与精神世界的改造。“传道授业解惑”早已是我国先人对于教育最直观的描述,反映了中国古人从客观层面对于教育实践活动的设想。当然,在西方文明的圣贤中也可以得到许多关于教育的营养,比如苏格拉底的研究、柏拉图的学术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等。总体来说,教育作为一种传递知识、建构文化、延续文明、改造人性的实践活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也正是由于教育活动的重要性,才使得关于教育符号的研究愈发受到现代人的关注。

实际上,教育活动中符号的运用是常态,也是一种典型的工具性实践行为。这是因为,符号是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元工具,自然也就是教育活动的元工具。如,教育活动中必须借助语言文字来传播知识、讲授相关概念和理论,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相关的知识点,而语言符号早已是符号学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与之类似的,语言文字的符号与伦理符号、艺术符号、审美符号、动态符号等类似,

都在教育活动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教育就是运用符号来改造人的过程,教育是不能脱离符号而存在的,失去了符号的教育是毫无意义的。也正是由于符号之于教育的重大意义,才使得教育工作者必须致力于研究教育符号的相关议题,进而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和水平,并用以更好地指导教育实践活动。

在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中,“符号”的意义更为多元化,用途更为广泛,产生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名称”的概念,认为“名称”具有“所指”和“能指”的特征,而这里的“名称”其实指的就是“符号”。柏拉图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先辈和导师,他运用的符号教育理念及方法对他的学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其中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亚里士多德将符号学的初始概念进行了精妙地总结,使其露出了最初的雏形,并且使之与教育活动本身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复杂联系。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多篇著述中专门提及了“符号”的概念、意义和方法等问题,提出了“符号具备认识论与本体论特色”的论点,并且指出了“符号作为一种引导和推进认知的知识工具”,在引导知识接收者方面的功能是极为显著的。

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符号具有严格符号逻辑的约束性质,这源于符号具有对其自身功能加以约束的形式机制”。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先贤不仅认识到了符号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指出了符号更为本质的内涵。同样的,在古代中国,很多的先贤与学者也对教育符号的概念进行了探索。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说的代表性人物墨子就认为“举、名、实三事并列而共实也”。而《墨子·经》上“举,拟实也”。这其中提到的“名”、“举”就可以视为现今的“符号”。当然,很多古代学者和大家对于符号的初始认知其实有自身的考量特色,但是与教育活动的关系则是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形成的。

时至今日,教育活动中符号的表达更为多元,更具多样性。教育活动中符号的存在是常态化的,无论是最基本的文字符号、信息符号、数字符号、图形符号,还是随着技术的演进而产生的更为复杂的多元化符号,都代表着教育活动推进所需要的基础材料和素材。符号在今时今日已经演变为教育活动所需要的工具和载体,符号之于教育活动的意义犹如“水滴之于江河,树木之于森林”,二者的关系可以用“须臾不可分离”来形容。因此,单纯从理论意义上解读,符号的意义和作用是无以计数,因为其对于教育活动的价值是无法以度量进行评估的。教育透过对人的改造来让知识得到传承、文化得到保存、文明得以延续,并以此建构起了完善的社会和国家,而符号就是这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工具。教育中运用的语言、文字、规则、方法、工具和思维,都要以符号的形式存在并表达出来,并透过“教育者→被教育者”的传播形式传递下去,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符号在教育范畴内有特定的意义,能够对于人的改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携带丰富教育意义的感知被植入到被教育者的脑海,成为了被教育者的习惯和意识,符号的解释便有了余地,符号的发展便有了依托。符号的解释是教育发展的基础,而无论好的还是坏的解释,都是符号延续发展的必然。而站在教育者的视角来看,推进教育符号的传播、解释,

让教育理论极大丰富,教育实践不断发展,这是社会赋予人的使命和责任。经验、感知、意义、知识都可以以教育符号或教育代号的形式加以表达,也可以从符号、指号的再度解释中得到发展,这就是教育文化存在的证据,也是教育实践得以延续的恒定基础。推进教育发展和进步,必然需要对符号进行丰富、解释和完善,而学习者、接受教育的人就承担了后续的任务,他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担负符号解释的使命。认识到教育中符号的内在意涵并知晓其发生作用的机理,便可以掌握这种规律来反作用于教育实践的运行,促进教育活动的进步与发展。

从皮尔斯、卡西尔等人的研究论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符号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人就是符号化的动物,人类社会就是有符号构筑起来的。作为特定意义的载体和代表,符号、符号和指号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一而足的,这一点自然也在教育活动中有极为充分的表达。从符号学的鼻祖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学的概念和理论开始,关于符号教育学的提法和概念始终没有成型,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理论力量和范式,使得教育活动与符号学的结合变得极为困难,这种困难主要表现在没有一套完全的符号教育学理论来指导教育实践活动。实际上,教育就是人的符号化改造的过程。人只有经过符号系统的洗礼、改造和科学教育,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完人”。这里的完人并非指道德意义上的完人,而是指的具备社会意识、成人能力和实践认知水平的正常人。在科学、约定俗成的、完备的教育下,人的身心能力可以得到很好地提升,基础的社会实践能力可以得到培育,人能够成为掌握知识的社会人,能够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当中,也能够为社会贡献力量和能量。因此,符号就是教育的载体和基础工具,也是教育发展必不可少的核心元素。

(二) 教育必须借助符号才能完成

现代教育活动的开展往往是点对点的过程,而且借助更多的新型手段和技术加以完善。从传统教育模式来看,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知识信息输出与接收的关系,教师是知识信息的传播者与输出者,学生则是知识信息的接收者。在这对关系中,教师往往处于知识信息的前端和上游,处在相对主动的主导者位置,而学生则处于较为被动的接收者的位置上。但是,无论是双方的角色如何变幻,其中恒定不变的一点就是教育推进的过程必须由知识和信息的输出、传播来完成,而教育符号就是知识、信息及其相关内容的统一载体。也就是说,教育符号的包容性、广泛性和多样性,使得其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充当的角色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突出符号在教育活动中的价值是教育发展的自身要求。教育借助符号的传播、传递实现了知识信息的下沉、转移,这是一个自然而良性的过程。

在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中经常运用的图示类符号,以简笔画或图标的简易形态呈现出教育相关内容,涉及到不同的教育门类或学科,便于教学的推进,也有利于写手的理解与认知。如图所示,在教育的实践中,符号经过解释被赋予意义,并且形成了与物质本体截然不同的意涵,最终才成为教育符号。比如在数学教学中经常用到的“ π ”,那就是圆周

率,就是一种典型的经过解释被赋予意义的符号,可以成为数学符号。 π 本来是希腊文中的一个字母,后来被专门用以代指圆周率。当老师、学生提到圆周率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到希腊字母“ π ”,同时会想到圆周率的数值:3.141592653589……。因此,在 π 仅仅是希腊字母的时候,它只是希腊文字中的文本代号,并未其他的意涵。后来,随着圆周率的发现以及研究、教育活动的深入,其专门用来代指圆周率,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约定俗成的规则。此时, π 就具备了教育符号的意涵,因此它经过了解释、被赋予了意义,而且可以在教育实践中发挥作用,即携带特定意义的感知符号。

在现代教育教学活动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形象化符号,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携带了特定的涵义,经过不同人的解释能够指向不同的载体,自然可以成为浅显的教育符号。因为符号具备约定俗成的公共性,同时也具备私密性的特性,所以对于符号的解释是存在差异的。在教育中,符号是实践活动推进的基础,教育要借助符号才能完成。教育是针对人的实践活动,而人本身就是符号的动物,所以教育与符号存在天然诉求的一致性。在教育实际工作中,借助各类具象或抽象的符号来构筑教育的体系,完成教育的操作,都是教育工作的要求,也是基于人的符号化而开展的必然实践。因此,认识到教育中符号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更好运用教育符号来提升教育品质是重要的前提性举措。^[1]

诚如前文所述,符号是教育活动开展的基础和载体,对于教育活动是不可或缺的。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感知载体,教育符号特指教育信息和资源的载体,因此这类符号的教育特性要被格外加以关注。教育活动中的符号有着多重的表现形式,也有着极为复杂的外在形态。教育符号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字符号、数字数据符号、图形图案符号以及色彩符号。其中,文字符号是整个教育类符号体系的核心形式,也是教育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石。教育之所以必须借助符号才能完成,就是因为符号作为基础性的工具载体具备不可替代性。自人类结绳记事起,无论是象形文字、楔形文字还是后来表音表意文字,都是一种携带特定意义和特定信息的符号载体,这种载体对于教育的完成来说是无法被取代的。符号就是教育性信息的最终表现形态,这对于教育活动的开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其中,文字符号是任何教育开展的基础,也是教育活动最重要的目的。以中文教育来说,汉字的符号形式就是任何中文教育都必须重视的,也是中文类教育推进的前提。汉字的符号携带大量的有效信息,具备意义的指向性、理论的堆积性和表达的多样性特质,与教育活动的实践有密切的联系。

从本质上来看,教育的开展必须以符号的简化、信息集聚和符号信息转移为依托,最终实现教育信息的灌输。教育中的符号是一种有特定意义和指向性的信息集成体,是教育实践的模式堆积。同时,符号的表现形式为教育开展提供了范式意义,帮助教育工作者更好地输出知识与理论内容。对于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来说,符号的便利性、信息多样性与传输的可操作性让整个实践更具效率,也大大提升了教育自身的品质。对于教育的接收者(即教育客体)而言,符号的学习就是接收教育内容的过程,也是更好地理解教育本质的

过程。

雅斯贝尔斯曾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树”“云”皆符号,离开符号寸步难行。这说明,教育的实质仍然是符号的运用和传播,只有符号化的活动才能使教育思想广布四方、敦风化俗、涵养人心。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白色的鸽子被赋予了“和平”的意涵,这其实就是由教育活动来实现对人的符号化改造的案例。具体来说,在学校老师的教育中,孩子们知道了白色的鸽子代表着和平、休战的意义,这种意识从小就会建构起来;在生活的日常教育中,电视、媒体中会提到每到重大节日或庆祝活动时,人们会放飞和平鸽来宣扬和平的理念,号召人们更好地珍惜和平生活的可贵;在人们日常的言谈举止或实践活动中,白色的鸽子代表着纯洁、和平与自由,因此逐渐有了和平鸽的意义载体。因此,一只白鸽透过人们对其意义的赋予及阐述,以及各类教育活动的宣扬,使得白鸽具备了和平的意义和指向性,而这种意义的感知在长期的宣传教育中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背后自然就是符号在发挥作用。这其中,教育负责来解释白鸽的意义,而载体和对象分别是白鸽、学生等受众,而解释项则不一而足,但其指向性往往是聚焦的。在系列的解释和教育实践中,白色的鸽子成为了和平的象征,并逐步成为了普遍的意识与认知。

所以,教育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进行分别解读,都能看到符号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没有符号便没有教育,教育必须依托符号来进行,这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事实,应该为人们更加清楚地认知。毋庸置疑,符号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才能逐渐建构并完善起来,教育与符号的联结才能更加密切,教育实践活动的发展才能由丰富的理论作为支撑,教育事业的推进才能更为顺畅。总之,从主客体双方的角度可以看出,符号的载体作用、信息传输功能以及知识转化的平台效应,让教育符号具备特殊的功能,同时也为教育活动的有效推进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教育的实施、完成必须依赖于多样化的符号媒介,而符号的媒介效应与载体功能也凸显了其自身价值,并更好地促进了符号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最终为促进教育符号实践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支撑。

三、教育与符号的统一

从教育本质来说,要实现对人的改造和提升,就必须依靠符号来推进。没有符号,教育是不可能存在的,人的改造和人类文化构建也不能完成。教育运用符号的更高级诉求在于,通过教育可以不断赋予世界以全新的意义,从而不断丰富符号理论,进而促进解释符号、改进符号、完善符号、创造新符号的实践活动,让符号实践不断推向前进。也就是说,符号理论与符号实践的完善、创新是教育最终的目标所在,也是教育活动的“元工具”,这是正向与反向彼此融汇的关系,其间存在密切的关联。首先,符号是一切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工具,也就是元工具。教育实践活动中用到的理念、丰富、工具、空间、环境、素材等,都要以符号的形式呈现,都要在符号化的框架内进行规范;教育实践的形式与内容,其实都是符号化的过程,都要在针对人的符号化改造的过程中发挥效力。同时,教育本身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参与的实

实践,而双方的共同点就在于要达成符号认知的一致,必须在相同的符号规范与模式下形成统一,这是符号化的表现。符号化其实也就是教育化,其实也可以成为教化,即运用符号来教导、教育和改造被教育者。认同正确的、科学的符号理论与教育理论,并以此来作为指导开展教育活动,完成教育实践,就是对于被教育者的改造,也是完成教育的任务和目标。

从符号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来看,符号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而教育同样也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由理论到实践,这不仅仅是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同样也是符号学和教育学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诚如前文所述,教育必须借助符号才能完成,教育本质上就是人的符号化的过程。而回归到教育的起端、发展、成熟和演进,能够看到教育活动对于符号的依赖从来没有消退和减弱,反而有愈发明显与强烈的趋势。一言以蔽之:教育是符号理论与实践融合、统一的过程,教育的基础就是符号理论实践的统一。^[12]

所谓的符号理论,在教育实践中可以成为教育符号理论,特指与教育实践活动相关的符号理论,如语言符号理论、艺术符号理论、信息符号理论、伦理符号理论等。符号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自然也就是教育发生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举例来说,小孩子进入幼儿园、小学开始初级的学习,许多新鲜的知识 and 常识开始成为孩子们的主观

意识,而孩子们正是在对各类符号的接触、认知、理解和运用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在此过程中,孩子们的知识面逐渐拓宽、认知能力逐步提升、实践水平得以改善。比如许多小孩子刚刚开始接触国旗的时候并不理解国旗的象征意义和价值,而经过书本的宣传、老师的讲解以及日常生活中各种媒体的信息普及,孩子们逐渐明白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白了五个星星代表的特定含义。

同时,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共同作用下,原本对于五星红旗认知较为单一的孩子会逐步丰富对其的感知和理解。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每当看到我们的五星红旗,每当举行升国旗仪式的时候,孩子们对于五星红旗的符号认知会变得丰富起来。如,在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有的孩子面对五星红旗会想到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会有一种由衷的自豪感和骄傲感;有的孩子凝视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会联想起我们的革命先辈为了新中国建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场景;还有的孩子,凝视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也许会想到自己的未来会前途光明、红红火火……这其实就是教育发生并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符号理论到实践拓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孩子们对于五星红旗的感知、理解和解释有了不同的结果,这是个人对于符号解释的结果,也是符号理论转变为实践成果的必然。

参考文献:

- [1] 崔乃文. 作为符号象征的通识教育与国家精英大学体系的建构[J]. 江苏高教, 2020 (01): 16-23.
- [2] 段俊吉, 熊和平. 论作业本的符号及其教育机制[J]. 教育科学研究, 2019 (12): 5-10.
- [3] 马蕾. 传统文化符号与高校青年文化身份认同[J]. 当代青年研究, 2019 (03): 26-32.
- [4] 朱立明.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学符号意识分析层次的构建[J]. 数学教育学报, 2019 (02): 81-86.
- [5] 李云星. 图像的育人价值与教育的图像转向[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19 (01): 172-177.
- [6] 李君亮, 栾忠恒. 符号化与生活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表达之争[J]. 理论月刊, 2019 (02): 32-38.
- [7] 栗晓红. 国家权力、符号资本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等级性和同质性[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8 (02): 134-150.
- [8] 冉云云. 教育语言学的理论架构及应用价值[J]. 中国高校科技, 2018 (03): 98.
- [9] 王世岳, 张红霞. 作为符号的通识教育: 以德国大学为例[J]. 比较教育研究, 2018 (03): 77-84.
- [10] 崔岐恩, 张晓霞. 符号教育: 第三次教育浪潮[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06): 79-85.
- [11] 赵毅衡. 文化: 社会符号表意活动的集合[J]. 社会科学战线, 2016 (08): 147-154.
- [12] 卢盈. 现代教育的“符号崇拜”[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6 (03): 65-72+103-104.

(责任编辑 李 维)